

從捷共第一書記更迭說起

尹慶耀

一月五日。「南斯拉夫通訊社」(Telegrafaska Agencija Nova Jugoslavija·簡稱TANJUG)首先傳出，捷共中央實行改組，六十四歲的第一書記安·諾沃特尼(Antonin Novotný)業已辭職，由四十六歲的阿·杜布契克(Alexandr Dubček)繼任。同時，政府總理約·勒納爾特(Josef Lenart)也已去職，由原來的副總理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奧·切爾尼克(Oldřich Černík)升任總理。這是東歐國家中繼羅馬尼亞之後，一次高階層人事的大變動，也是數月來捷克政潮的一個初步結局。然而，其意義是相當不平凡的。

一 史達林主義者——諾沃特尼

諾沃特尼於一九〇四年十二月出生於捷克布拉格近郊之列特那尼地方。少年時作過鎖匠學徒、工廠勞動者，曾參加社會民主黨，於一九二二年脫離，與其一派於同年五月十四日另組共產黨。一九三五年代表布拉格出席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三國際第七次大會，回國後即脫離工廠工作，專任黨內組織工作。一九三八年希特勒佔領捷克後轉入地下，一九四一年被捕，拘於茅陶森集中營達四年之久。一九四五年美軍收復捷克時被釋，任布拉格地區黨書記。一九四八年二月，捷共發動政變攫取政權，被任為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一九四六年當選中委，一九五一年任中委書記，一九五二年取代史蘭斯基(Rudolf Slansky)為政治局委員，一九五三年二月被當時捷共首領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任為副總理，兩月後哥死，諾沃特尼取得黨的領導地位，九月間任捷共第一書記。一九五七年捷總統安·薩坡托茨基(Antonin Zاپotocký)病逝，諾沃特尼即兼任總統以迄於今。

從捷共第一書記更迭說起

諾沃特尼表情嚴肅，缺乏幽默感，素有「黨的機械」之稱，在國內頗少人望。尤其是一九五一年，前捷共總書記史蘭斯基(諾之死敵)被整肅時，諾為主要主持人之一，而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對史蘭斯基的公審，也最像一九三六至三八年蘇俄的莫斯科大審，因而，人們一直把諾沃特尼目為史達林主義者。當時以「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罪名與史蘭斯基同時被整者，尚有前外交部長克里曼第斯(Vladimír Clementis)等共十一個高級人員被處刑，其他大小共幹及黨員被犧牲者不計其數。自黑魯曉夫發動反史後，東歐各國共黨中過去在史達林時代被整肅者，陸續恢復了名譽。但捷克的反史運動頗不積極，而克里曼第斯等恢復名譽，也是最遲的。諾沃特尼在國內雖不得人望，但一直對莫斯科忠心耿耿，得以繼續保持他的寶座。惟黨內反諾沃特尼浪潮早已逐漸高漲，尤以最近三月為甚。去年十二月八、九日，布里茲涅夫親自訪問捷克，企圖挽救諾沃特尼的命運。因為今年二月底在匈京布達佩斯舉行的世界共黨協商會晤，以及蘇俄所期望的新的世界共黨代表會議，捷共都是支持者之一，它希望捷共內部能夠安定，以免影響捷共的立場。

捷共中央主席團從十二月初即開會爭吵，最後委員十人中，除諾沃特尼本人及勒納爾特外，其餘八人均主張諾沃特尼下台。原定十六日召開的中央全會，也延至十九日開始，經過約八十位委員的激烈爭辯，諾沃特尼仍難獲優勢，被迫舉行自我批判。全會於二十一日後經短暫休會，至今年元月三至五日再開，結果決定諾沃特尼辭去共產國家中掌握實權的黨第一書記，為了「面子」，讓他保持一個總統名義。這在共產國家說來，已經算是很可滿意的結果了。

二 經濟改革的失敗

(53) 三四七

捷克是共產集團內的先進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第一任大總統馬薩里克(Tomas Garrigue Masaryk)博士創建了民主的捷克，他的繼任人員奈斯(Eduard Benes)也有民主政治的彗星之稱。在第二次大戰之前，捷克的工業技術已相當發達，其工業產品僅次於德國。這一個天然資源并不富裕的工業國家，不能不以貿易立國，當時它是西方經濟社會中的一員。一九四八年二月在蘇俄外次佐林(Valerian Alexandrovich Zorin)的導演下，捷克發動政變，才使捷克完全赤化。不過，當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在日內瓦簽訂時，捷克尚在完全赤化之前，當時就加入為會員國。一九四八年它也打算參加復興歐洲戰後經濟的「馬歇爾計劃」，但被史達林所阻止，其時捷克外長馬薩里克(Jan Garrigue Masaryk 捷克國父老馬薩里克之子)被迫跳樓自殺。此後，捷克在經濟方面，也就完全轉向「東方」。

東歐赤化之初，政治、經濟都是一種附庸體制，其生產活動的目的，在協助蘇俄的戰後經濟復興。史達林死亡，尤其是東歐動亂之後，東歐經濟上的附庸性質有了某種程度的改善，但它們模倣自蘇俄的史達林所建立的經濟制度，依然存續迄今。這種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徵，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和自給自足的性質。然而，像捷克那樣以貿易立國的國家，原料、燃料不能不從國外購進，產品不能不對外輸出。由於政治的原因，它和西方的經濟關係已大為減弱，而在中央集權的計劃管理制度下的產品，規格陳舊，品質低劣，在西方市場也很難找到銷路，於是就只好更加重對「東方」的依存。一九五六年「經濟互助委員會」舉行大會時，諾沃特尼就提出國際分工專業化的建議。他是把「經互會」當作赤色共同市場，通過國際分工專業化，使捷克的原料、燃料供應及產品輸出，獲得安定的市場。可是，「經互會」的合作并不圓滿，捷克將其工業產品的四分之一供給東歐各國，一九六三年時捷克輸出的機械中九五%賣給東歐；但它從東歐各國買不到什麼好東西，連糧食也得由蘇俄和加拿大購進。更糟的是，產品只供給東歐，使得它的工業技術大為落後。現今捷克人領悟到，捷克一直為東歐製造電車等等，乃是一種拖累，如果捷克不參加「經互會」，而成為西方的一員，它的工業水準可與西德併駕齊驅，而今却甚至落在奧國之後。戰後二十餘年的光陰虛擲了，捷克人不滿地叫出：「不能永久為東歐農業國作犧牲」。

一九六一年以降，東歐的農業生產停滯，工業成長率降低，到一九六三、六四年經濟困難相當嚴重，尤以捷克為最。一九六二年的農業成長，一九六三年的工業成長，都發現負數，由一九六一至六五年的第三次五年計劃，被迫於一九六二年就中途放棄，一九六三年實行一年計劃，但成績欠佳，一九六四、六五年繼續經濟調整。自一九六六年起，才實行新的五年計劃。

由經濟困難而實施經濟改革，捷克也可說是急先鋒。一九六六年就決定了經濟改革的方案，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即付諸實施。改革的重點在修正計劃管理制度和價格的改訂。它在實行所謂「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使計劃和市場的關係更具有彈性，賦予企業更多自由，使它們自主的負起責任，取消國家的補助，對企業所得課以一定稅率，允許企業有權憑考績給予升級及獎金。它甚至把康采恩、股份有限公司等名稱加給其企業聯合。在價格方面，則分為固定、限制、自由價格三種。因此，在共產集團內，有人譏諷說捷克的確會獲得那樣的印象。在東歐，對蘇俄經濟學家李柏曼(E. Liberman)評價不高。南斯拉夫的學者譏諷李柏曼只是高聲叫嚷，而提不出具體政策。相反地，作為經濟改革的學者，捷共中委捷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奧塔·錫克(Ota Sik)的聲望，要比李柏曼高得多。可是，要實行經濟改革，就不能不向西方學習，這一點不光是經濟學家們如此主張，在一九六六年三月間，連當時捷克副總理穆涅克(Otakar Simunek)也說：「捷克經濟明顯地落後於西方。竭力避免把東西方做比較的態度，早應該放棄了」。

然而，向西方學習和走資本主義道路，並不是一回事。捷克政府曾一再說明：「這次經濟改革，以最大限度提高從業員的主動性為主要着眼點，在計劃經濟和生產手段社會化的基礎上，不會重回到資本主義道路」。這是對的。事實上，儘管名義上把計劃權限下放到企業階層，但那裏的企業決非像西方的企業可以完全自主、彼此競爭。共產國家經濟之病，就是公定價格。而捷克在改革之後，固定價格仍佔六〇%，那些都是與產品成本之形成直接有關的商品。其餘的商品以耐久消費財為主，由政府規定最高與最低價格，在這其間可以上漲或下落。而這些物品在赤色共同市場銷售時，東歐國家擔心它會永遠停在最高價格上。至於一小部分商品採自由價格，那是些新型產品或季節性產品，主要是與人民生活有關的。總之，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之

下，所謂改革的幅度并不像宣傳的那樣大，其效果當然也就有了限度。

改革的成敗，不僅關聯到制度本身，而執行的是否得力却更關重要。可是，捷克一如其他共產國家，保守的官僚主義就是改革的一大障礙。若干保守派的黨政官僚，習慣於過去的統制經濟，害怕放寬統制會引起物價波動，當然，他們更擔心改革會使自己失掉其現有權力地位。其次是新制度相當複雜，各企業負責人也不充分了解。他們中間的大多數能夠佔此高位，與其說是憑其企業家的技能，毋寧說是憑其黨齡或革命經歷。過去，他們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即使斷了本也有國家補助，因之他們缺乏冒險的改革精神，也就不積極認真地謀求企業體質的改善。勞動者們過去生活雖苦，但物價安定，生活可望慢慢改善，而今所謂加薪、獎金在數額上未必能構成刺激，而他們已經先要擔心物價上漲了。即以集體農場而言，過去每一個集體農場都配有生產定額，那是由上級規定的，譬如當地條件只適於畜產，上級也許規定你要生產甜菜。自一九六六年以降，中央只調整全國的生產品類，對於各個農場的生產定額改以現金計算，因此各農場可依其土壤氣候等自然條件，決定其生產品類。那末適於畜產的就不再種甜菜了，但同時物價也高了，而過去對家畜的巡迴免費醫療也取消了，農民仍舊嘖有煩言。本來，捷克人是相當勤奮的，可是自從實行公有財產制以來，他們也變得消極、懶惰。現今捷克已感勞動動力不足，但西方旅行者認為在捷克的各個生產領域，都是兩人做一人的事，這種現象能有改善，人力不足的威脅即可解除，然而，在共產制度之下，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總之，改革本身既不徹底，再加上上級保守官僚的積極阻撓，和下級企業經營者以及工農大眾的消極瞻望，經濟改革就難以收效。經改實驗一年來的總結是，國內經濟困難增加，對西方雖進行傾銷式的輸出，結果仍然入超。而糧食自給率一向僅達五〇%，爲了向外購糧又需要大量外匯，這樣它的國際收支就要惡化。

去年九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的捷共中央全會中，黨中央經濟委員會主席魯·什特洛加爾(Lubomir Strougal)報告說：當前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是經濟改革的結果，尤其是去年一月一日起實施的批發價格改訂方式錯誤，對生產成本作了不當的過高估計，使批發價格大幅上升，連帶着零售價格高漲，使勞動大眾生活水平降低。另一方面，企業利潤增加，勞動者工資

隨之上漲，購買力業已提高，但重要消費物資，不能確保市場供應，自然會物價飛騰。

在此情形下，連黨機關報上，也常常出現不滿之聲。一般國民因生活困苦而不安，自是意料中事。這些，都會授所謂革新派以攻擊的機會。

諾沃特尼本人自然是希望經濟改革成功的，但他所率領的保守派或則故意、或則畏首畏尾地未能予以圓滑推行，也是事實。諾沃特尼曾被迫在十二月全會中自我檢討，承認對新制度處理不當，以致使經濟情形惡化，且招致國內政治情勢的緊張，他自己應該是主要的負責人。然而，這樣的自我坦白，也未能挽救他的政治命運。

三 對西方關係調整的困難

捷克赤化之後，一如其他共產國家，不斷增建廠礦，盲目擴充生產企業的數量。另一方面，原有的企業，仍在使用幾十年前的機器設備，這自然使得效率降低、技術落後。現今新的生產企業既不易擴建，舊的企業設備又不易革新，因為它資本不足。要求根本改善，就需要大量的西方金錢，那是說它需要增加對西方輸出以換取外匯，或者向西方貸款并歡迎西方的投資。可是，所有這些，都不符合保守官僚所固有的馬列主義觀念，而且會受到蘇俄的阻撓。

捷克要與西方加強經濟聯繫，首先就得改善對西德的關係。近年來，西德與東歐各國之間都訂有長期貿易協定，接受其爲期五年的信用貸款，并互派享有外交權的通商代表部，不過東歐也默認西柏林屬於西德馬克地區之內，惟捷克堅持在代表部派遣之前，西德應先聲明西柏林與西德分離，以致此項問題遲遲不能解決，直到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雙方才協議互派代表部，但不能享有外交權，捷克且不承認西柏林爲西德馬克地區。西德駐捷克的通商代表部，本擬今年一月早日派出，但因捷克政變勢將延至月底。

一九六七年一月，羅馬尼亞與西德建交，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原本都想步羅後塵，但因爲蘇俄在背後施加壓力而中止。三月，捷克與東德、波蘭互締「友好互助條約」，組成鐵三角，那是爲了蘇俄、東德與波蘭的利益而對付西德，對於捷克並沒有絕對的必要。不錯，捷克人腦海裏念念不忘「

慕尼黑協定」，但捷克和西德之間，並沒有像波蘭那樣的奧德——尼賽邊界線問題，與西德建交，才合乎捷克本身的利益。然而捷克却對西德一直採取強硬的態度，上述通商代表部的交涉，也顯然是由於西德的讓步才獲得協議。這在政治上或者可稱為一項勝利，但在經濟上却毋庸說是一種失策。這一點，一味追隨莫斯科的諾沃特尼是應該負責的。

但是，爲了挽救經濟危機，促使經濟改革成功，捷克不能不加強對西方的經濟關係，這自然是蘇俄所不同意的。目前蘇俄僅僅靠宣傳西德的軍國主義及核武裝的威脅，已不足以恫嚇東歐國家（對此真正同調者恐怕只有東德和波蘭），因此它也必須使用經濟壓力，來迫使東歐繼續留在蘇俄的勢力內。目前，東歐各國對蘇貿易約佔其貿易總額的三〇—六〇%，原料依存度爲七〇%，糧食、燃料（除羅馬尼亞自產石油外），動力也要由蘇俄輸入，尤其是捷克。一九六五年九月諾沃特尼訪蘇，要求提供小麥六〇萬噸被拒，新簽的一九六六—七〇年蘇捷長期貿易協定中，蘇俄也拒絕供應小麥，等到西方報紙予以指責，才恢復了小麥供應。就在同年年秋，布里茲涅夫在東斯洛伐克講演時，公開聲言使用蘇俄原料製造的產品，是不應該對西方輸出的。可是儘管如此，捷克仍不得不增加對西方的貿易，爲自己尋求活路。

據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ECE）的統計，捷克於一九六六年輸出總額二七億四、五〇〇萬美元，輸入總額二七億三、六〇〇萬美元，貿易收支大抵平衡，惟單就與西方先進國家貿易言，則有四、七〇〇萬美元的赤字。就總的趨勢言，捷克正把它的貿易對象由「經互會」慢慢轉向西歐。它從西方先進國家輸入品中增加最多的，是高度精密機械，那是它推進工業近代化所必需的。然而，在一九六六年「經互會」國家中，貿易總額增加最少的就是捷克。一九六七年成績也不見佳，這使所謂革新派非常不滿。因爲捷克的經濟改革，不僅須與西方增進貿易，還應該吸收外資來解決本國的資本不足，這些都不是保守派的對西方步調所能獲致的。

四 知識份子的反抗

經濟上既需向西方學習、與西方加緊往來，思想文化也必與西方接觸和交流。目前，捷克的電影和演劇都向外輸出，不過越是在國內受共黨批判的

越在國外受歡迎。「羅密歐與茱麗葉」的演出，在布魯塞爾最爲轟動。捷克爲什麼把那些東西對外輸出呢？據西方人士最直捷了當的回答：「是爲了賺錢。電影比斯克達（捷克最大的機械工業）更能賺到西方的外匯」。然而，在這樣的交流中，捷克會受到什麼影響呢？

本來，共黨永遠不承認自己有錯誤，它們把過去經濟上一切積弊都諉之於史達林，於是經濟改革就和反史運動同時並進。要改革就不能不對過去有所檢討批評，可是須有一定的限度。換言之，批判史達林主義是可以的，但不能反對馬列主義；批判官僚主義是可以的，但不能反對共產黨；向西方學習是可以的，但不能在思想上和平共存。問題是共黨希望知識份子吶喊助威，而喊聲又須永遠維持在一定高度上，那是否可能？

例如，捷克的密勒氏就說：馬克思列寧那古典的資本主義觀念業經破產，它對於資本主義的長足發展、工藝技術的成功、勞動者實際收入的增加、生活水準的提高，已不能加以說明。要說明戰後西歐的發展，就需要一種新的理論體系的規範。切喬尼克講師說：社會主義只能存在於經濟發展在平均或平均水準以下的國家。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不僅在生產力方面，就是在企業的組織、管理方面，都可以作社會主義國家的模範。這些說法，顯然已超過共產黨所希望的限制度。

在思想方面最爲敏感的是文藝界。早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剛好是黑魯曉夫文藝整風後不久），捷克科學院主辦東歐文學家會議，當時就對加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予以重新評價。加夫卡是生於布拉格的德國籍猶太作家，生前並無藉籍名，第二次大戰後被西方認爲偉大的存在主義作家，而東歐一直禁止他的作品出版。不過，他的「流刑地」「審判」等作品內所描寫的，很像史達林時代的黑暗社會，引起鐵幕內若干人的共鳴，於是才被列爲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範圍之內，允許他的作品在鐵幕內印行。

所謂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藝路線，早已爲文藝家們所不滿。最近，文藝界在強調民主主義，批判精神也已抬頭。個人開始受重視了，捷克文藝家不願再遵循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規範，去描繪、雕塑一些實際上并不存在的共產主義的偶像。連國家設立的科學院，也在三、四年設立了社會學科，而過去社會學是和共產國家無緣的。

可是，共黨並沒有放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文藝政策，甚至也不會取消

檢查制度。捷克現今還存在着「新聞統制本部」(HST D)，對所有出版物的校樣都要加以檢查。不過，「HST D」往往不願自行負責，而送往黨中央思想理論部門去請示，思想理論部門也不願自己批上「不准」的字樣，而建議雜誌編輯部自行處理，雜誌編輯雖然都是黨員，但常作自由主義的處理，因此「反黨的」文藝作品或評論，也常常出現在雜誌上，這使得保守的共黨官僚異常不滿。

一九六七年時，布拉格對三位「反叛的」自由主義文化人加以審判，罪名是將「損害共和國名譽和利益」的論文或創作寄往西方雜誌出版。這三個人是：在捷克青年階層中頗有盛名的三十一歲劇作家和短篇小說作家楊·貝奈斯；製片人卡勒·薩梅切克；新聞撰稿人鮑威爾·提格里德。最後一人在巴黎未曾歸國，就實行缺席裁判，他於一九六六年九月號的「東歐」雜誌（在美國發行）上，發表了「結冰與融雪·文化風土」一文，對捷克共黨的文化統制政策痛加批評，因而被控反叛和間諜罪。據西方記者報導，當時捷克著名文化人約三百名，聯名致書諾沃特尼政權，要求將被審判者立即釋放。

同年六月底第四屆捷克作家大會舉行了三天，第一天即二十七日捷共政治局委員兼書記主管思想理論問題的伊·亨德利赫（Jiří Hejdrých）登台演講，指責捷克作家們要求文化自由、創作活動自由的傾向。他要求作家們站在階級的立場上，對社會主義負起政治責任，不能夠接受資本主義歐洲的敵對思想。可是，登台發言的作家們指出，文學站在階級立場上，就會墮落成宣傳文學。他們反對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劃上一條鴻溝，認為捷克是社會主義國家，就得對西方築起一道牆，乃是史達林的鎖國文化。有的作家公然主張超階級的文學。這三天的大會，恰像一次反對諾沃特尼政權文化統制政策的集會。

大會攻擊的目標之一即檢查制度。同年五月蘇俄作家召開第四屆大會時，暴露史達林時代集中營的非人生活的小說「伊凡·丹尼索維奇的一日」的作者索爾傑尼欽（Aleksandr I. Solzhenitsyn），有一封公開信大罵蘇俄的檢查制度。這封信的影印本，也被在捷克作家大會中當眾宣讀。

亨德利赫曾要求捷克作家協會，將新理事會中四十五名中的三名，被他認為是最「反黨的」一名作家魯德維克·瓦茨里克；鮑威爾·科霍烏特；瓦茨拉夫·哈威爾等剷除，但因作協首腦部的頑強抵抗而失敗。

從捷共第一書記更迭說起

這事情勞動了諾沃特尼本人，大會閉幕兩天後，他於七月二日在黨校畢業典禮中演說稱：「我們不能默認我們是像第四屆作家大會所指責的在經驗着第二個中世紀。這些人攻擊黨的政策和國家的內外路線，提倡與西方思想共存，不承認階級鬥爭……他們是想要在捷克扮演第三勢力的角色，我必須這樣告訴他們。黨在國家生活方面，要斷然採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在這一點上，我們絕不妥協……我們絕不容許和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和平共存」。

諾沃特尼的演說是在向知識份子挑戰，強調思想、文化、藝術要接受黨的領導。

去年九月的捷共中央全會中，亨德利赫展開反擊。他把作協主席楊·普洛哈斯卡的中央候補委員取消，把作協大會中對現政權攻擊最激烈者魯德維克·瓦茨里克、伊凡·克里瑪、安托寧·李埃姆三位作家驅逐出黨。又把作協機關雜誌「文學報」(Literární Noviny)改隸文化、情報部，該部部長卡勒爾·霍夫曼，將「文學報」編輯部十六人中的十一人免職，其餘五人也因抗議而辭職。

十月二十六日，亨德利赫整肅作協主席團，派任了十六個新委員，其中四人為亨德利赫系的保守派御用作家，十一人為在黨與作家鬥爭中維持「中立」的作家，只有楊·蘇卡切爾一人是被加上「修正主義」頭銜的反對派作家。

自一九六二年杜布契克任斯洛伐克共黨第一書記以來，斯洛伐克的作家們也成為自由化的先鋒。去年八月十六日，著名斯洛伐克作家拉第斯拉夫·穆尼雅切克，因抨擊諾沃特尼政權追隨蘇俄的中東政策，是反猶太主義，被開除黨籍且剝奪國籍。這除了引起知識份子的不滿外，更招致了斯洛伐克人的憤怒。

十月三十一日，布拉格大學生因頻頻停電，妨害自修與取暖及宿舍生活條件惡劣，舉行示威，事實上那是對諾沃特尼政權迫害作家的抗議。因警察當局下令鎮壓，結果有學生十二人及警察三人負傷，另有多數學生被捕。這事件引起其他學生抗議示威，被捕學生終獲釋放。然而，這更激起知識份子及一般人民的不滿。

十二月十五日，諾沃特尼政權發表聲明說：學生示威的手段是錯誤的，但警察方面的行爲，也不無過當之處。這等於自承錯誤，公開謝罪，在共產

國家是不常見的。

諾沃特尼政權與知識份子尖銳對立，也是失敗原因之一。

五 值得注意的未來動態

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間的地方政見，由來已久，它并未因共產政權的國際主義而消除。其實，國際共產黨還曾對它加以利用。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流亡在倫敦的捷克政治領袖們，公推貝奈斯赴莫斯科，與史達林簽訂友好互助及戰後合作條約。當時貝奈斯對捷共首領哥特瓦爾德的要求，還曾加以拒絕。一九四四年蘇俄組成一個名為「斯洛伐克民族解放運動」(Slovak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的外圍團體，蘇俄揚言將承認該組織，一如其承認波蘭的盧布林委員會，迫貝奈斯把原先業已拒絕的哥特瓦爾德的要求加以承認，將捷克東部的路斯尼亞(Ruthenia)割予蘇俄。一九四五年四月在斯洛伐克的科息斯(Kosice)成立由共產黨操縱的「聯合政府」，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綱領，貝奈斯只好參加這個「聯合政府」，給予捷共由量變到質變以完全攫取政權的機會。

共產黨利用地方政見以達其赤化捷克的目的，但在赤化之後却不能把地方觀念澈底消除。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一向由捷克人獨佔。捷克地區沒有獨立的共產黨，捷克共產黨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而斯洛伐克地區有獨立的共產黨，那是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亦即捷克共產黨的地方黨部。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黨員總數一六八萬人中，斯洛伐克共產黨員僅三〇萬人(捷克人口九百萬，斯洛伐克四百萬)。事實上斯洛伐克是在受着歧視。當年諾沃特尼藉史達林整肅托主義者的機會，大肆排除異己時，斯洛伐克人克里曼蒂斯以一個「民族主義者」被整肅，是斯洛伐克人所迄今耿耿於懷的。此外，在經濟發展方面，斯洛伐克也比較落後，而黨中央也故意作差別待遇，對斯洛伐克地區的投資極少。因此，一部分斯洛伐克的經濟學家，曾主張將斯洛伐克的預算，從中央預算中分離而獨立，這迫使諾沃特尼在去年八月視察斯洛伐克時，列舉若干統計數字，力陳斯洛伐克與捷克在經濟上結合，絕無不利。可是，在今年年初，諾沃特尼也不得不坦白承認，斯洛伐克地方的生活水準，趕不上波希米亞地方。

諾沃特尼辭去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新任第一書記布杜契克原本

是斯洛伐克共產黨第一書記，一向是主張斯洛伐克經濟利益的急先鋒，對於目前捷克推行的新經濟制度，他自然歡迎那放寬中央集權而提高地方自主性的趨向，他主張中央要確保充分的投資資金，也要求大幅增加加斯洛伐克的地方投資。他的上台當然是斯洛伐克人所歡迎的，但捷克人的觀感又當如何呢？

諾沃特尼仍是總統且仍為政治局委員，亨德利赫等也依然健在，保守派勢力并未消失。政治局委員已由十人增至十四人，楊·比勒爾(重工業部副部長)、約瑟夫·謝帕捷克(南摩拉維亞州黨第一書記)、埃米爾·里哥(斯洛伐克科希采治金聯合企業黨委會主席)、約瑟夫·勃爾普加(多拉尼村統一農業合作社主席)，都一躍而成為政治局委員。但即使他們都是革新派，是否即能壓倒保守勢力的反抗，也不無疑問。

綜合以上所述各點，可知諾沃特尼垮台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例如經濟改革推行不力，經濟情況逐日惡化；政治上的與地方上的派系對立；文化方面的混亂，知識份子的反抗；對蘇俄與對西歐關係調整的困難等等，不一而足，加以他那史達林主義的色彩，尤對他十分不利。

可是，新的年青的第一書記布契克，雖然被目為革新派，他是否能把那些難題，一一順利解決呢？

首先，布契克是改革的積極主張者，他的總理切爾尼克原本是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也是經濟改革中最有關係的人物。然而，如上所述，對經濟改革持消極態度者，不僅是諾沃特尼麾下那一小羣保守主義者，也不僅是高級的官僚，而是連基層人員甚至工農羣衆都不够了解、不够積極的。而且，共產國家的經濟改革，是在原有的經濟制度上採用西方的經營技術，中央集權的所有制度和自主自發的運營精神之間，原本是一種矛盾。因此，經濟改革能够迅速出現奇蹟，畢竟是不容易的。

人們也期望着在經濟上主張革新的布契克，會在文化方面更加自由化。然而，除非共產黨真正能够放棄其思想統制，否則自由化就終須有其限度。

斯洛伐克比較上算是農業地區，工業發展不如捷克，今後即使較前獲得更多投資，能有若干進步，但經濟發展程度，不能一朝一夕就可大量改變的。至於根深蒂固的地方觀念，更非布契克所可輕易消弭。

布契克本人也是親蘇派，對莫斯科的忠誠，當不致受到懷疑，而捷克

在未來二月底匈京布達佩斯舉行世界共黨協商會臨時時，也可與蘇俄站在同一立場。但爲了本身的經濟發展，需要與西方增進經濟往來，因之其西歐尤其是對西德的態度，就不一定會和諾沃特尼一樣，唯莫斯科之馬首是瞻了。

總之，在東歐經濟改革的熱潮中，經濟上的先進國家、改革內容也最爲大胆的捷克，却遇到如許挫折，甚至引起高階層人事的更迭，對於東歐說來，那不是一項好消息。

蘇俄竭力阻止東歐在經濟上接近西方，施加壓力，使波蘭（它因利害關係，應該是自動的）、捷克、匈牙利、保加利亞，都與東德締結友好互助條約，迫使它們仍繼續留在蘇俄勢力範圍內，尤其是防止它們與西德接近。從此一觀點看來，一直對蘇俄唯唯諾諾的諾沃特尼的垮台，對蘇俄也不能算是一項好消息。而布里茲涅夫出現布拉格去爲諾沃特尼護駕，實有干涉內政之嫌。事雖失敗，但捷人的反感將對今後關係有若干影響。

總之，捷克事件是不尋常的，今後它在蘇俄集團可能引起的連鎖反應，頗值得注意。

國際人物

澳洲新揆——高登

李少唐

參議員組閣第一人

現年五十六歲，牛津大學碩士、二次大戰期間的戰鬥機駕駛員、曾兩度來華訪問被譽稱「中國之友」的參議員、兼教育及科學部部長約翰·G

·高登（John Grey Gorton），原頗屬意於總理寶座之自由黨副魁兼

月九日在經過兩次投票，擊敗三位強

澳洲新揆——高登

本文主要參考資料：

(一) 劉光炎譯鮑斯卡倫（Anthony T. Bouscaren）著「共產帝國主義。國立編譯館出版。

(二)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四、二十六日日本「每日新聞」堀江薰雄：「蘇聯東歐經濟合作之旅」。

(三) 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三十一日「每日新聞」林三郎：「知識份子拾頭的捷克」。

(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文「世界週報」：「加強中的知識份子的反抗——捷克作家判刑的背景」。

(五) 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聯合國歐洲經濟委員會（E.C.E.）所發表之有關東西歐貿易之報告。

(六)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世界週報」原子林二郎：「諾沃特尼下台及其波瀾」。

(七) 其他有關新聞報導。

Malton) 迫於第二大黨「國家黨」由黨係澳洲執政黨及最大黨，其黨魁總裁、代總理麥克溫（John McEwen）自然成爲執政的總理，高登遂亦成爲之公開反對，爲避免引起聯合政府澳洲以參議員出而組閣的第一人。

決裂，而自行退出角逐後，高登之出任閣揆即已爲一般所預期。一月九日例，高登於當選後，將辭去參議員一黨魁之爭中，八十一名自由黨國會議員（包括二十二名參議員）全體出席遞補特遺缺所舉行的衆議員中期選

投票，移民部長史奈登（B.M. Sneyd）舉，獲取衆議員席位——赫金斯市一（den）及勞工部長柏瑞（L.H.E.）向被視作自由黨的安全選區。

Bury）均於第一次投票時即被淘汰

與高登競爭最烈之外長海斯洛克（Paul Hasluck）亦在第二次投票中

遭受挫敗，高登以超出海斯洛克二十白宮間的聯繫，同時，澳大利亞將繼